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丛书（一）

恢复时期的国民经济

1949—1952

-52/3
柳随年 吴群敢 主编

责任编辑：周学俭

许文峰

封面设计：张若一

(内部发行)

恢复时期的国民经济

(1949—1952)

Huifu Shiqi de Guomin Jingji

柳随年 吴群敢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4 12/16·字数100,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4093·104

定价：0.43元

目 录

一、前 言	1
(一) 旧中国的经济面貌	1
(二)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9
二、新生的起点	14
(一) 新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	14
(二) 没收官僚资本，控制经济命脉	18
(三) 在市场中与投机资本的较量	23
(四) 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的胜利	28
三、争取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	37
(一)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	37
(二) 合理调整工商业	40
(三) 继续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一切封建制度	46
四、在抗美援朝中改组与恢复经济	54
(一) 战争爆发后的财经工作方针	54
(二) 清除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和反封锁禁运的斗争	56
(三) 沟通城乡经济，稳定和活跃市场	61
(四) 增产节约运动和“三反”、“五反”	65
(五) 不失时机地进行重点建设	69
五、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逐步建立	74
(一) 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领导地位的确立	74
(二) 个体经济的变化和集体经济的发展	77

(三) 资本主义经济的改组和国家资本主义	
经济的产生	82
六、恢复时期的成就和经验	86
(一) 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86
(二)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初步改善	94
(三) 丰富的历史经验	98
附录一 统计资料	111
附录二 经济大事记	114
后 记	148

一、前　　言

(一) 旧中国的经济面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领土面积达 96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总数约占全人类的 1/4，居世界首位。在这辽阔的国土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土，逶迤不断的大小山脉，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泽和漫长的海岸线，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祖先从远古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用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中华民族以聪明智慧、勤劳勇敢而称誉于世。

但是，持续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迟缓的状态。当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先后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较封建社会远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并纷纷向世界各地寻找殖民地时，闭关锁国的中国也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被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门户。从此，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侵略者肆意蹂躏，无数善良的劳动人民在沉重的剥削压迫下挣扎呻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的经济是畸形的半封

建半殖民地经济，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1、帝国主义控制了我国的财政经济命脉。

封建落后、地大物博的中国，被帝国主义各国视为一块大肥肉。他们通过侵略战争和其他方式，迫使中国历届反动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但强占了我国领土、索取了巨额赔款，而且控制了中国的通商口岸、铁路交通和海关，在中国开设银行、兴办工商企业。帝国主义强盗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并且通过资本输出，控制我国经济命脉，疯狂地掠夺我国宝贵的资源，大量倾销其剩余产品，使我国沦为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廉价的工业原料、劳动力的供应基地。特别是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设立银行，进一步垄断了我国的财政和金融，帝国主义成了左右我国经济、政治、外交的“太上皇”。

在抗日战争前的 1936 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财产约合 43 亿美元。其中帝国主义工业资本据我国统计资料记载，约占当时整个工业资本的 41%，垄断了生铁产量的 80%，原煤产量的 56%，发电量的 76%，棉布产量的 64%，卷烟产量的 57%；帝国主义霸占的交通运输业，航运吨位占 69.5%，铁路里程占 90%。外国在华银行约 32 家，分支行 141 所，在华资产 19 亿美元，在金融业务中占有垄断地位。借给中国政府的贷款，均需由中国政府主要财政收入的关税、盐税担保，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源。

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攫取了大量超额利润。以美国为例，从 1894 年到 1937 年，它在中国的企业资本共 10.5 亿美元，而汇回的企业利润为 20.08 亿美元；借给中国政府的贷款 7

亿美元，而汇回的借款利息即达 14.3 亿美元。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使用武力排挤了美英等国，独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和经济利益。他们疯狂地掠夺我国资源，在 1938—1945 年掠夺的铁矿石达 4630 万吨，生铁 957 万吨，原煤 3.46 亿吨。在沦陷区我国民族资本经营的重要工业企业，也大多被日本帝国主义控制和吞并。

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美帝国主义又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头号掠夺者。它通过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别是“中美商约”，得到了独霸中国市场的权利，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迅速膨胀。1936 年，美国资本只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 8%，到 1948 年则已达 80%。美国在华直接拥有近 300 个企业，其中有大型发电厂和拥有许多分支机构的银行、石油公司等。更重要的是，美帝国主义打着经济合作的幌子，通过投资和向蒋介石政府“贷款”，控制了大批官僚资本企业，并使民族资本企业受到严重影响。美帝国主义还采取“美援”形式向中国大量输出其过剩商品，据海关统计，1947 年从美国输进的商品量占我进口总额的 50%，使美货充斥市场，泛滥成灾。

2、地主阶级占有农村的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

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没有破坏腐朽没落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相反，它和农村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把地主阶级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

在旧中国，土地分配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不到 10% 的

地主、富农，占有 70—80% 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 90% 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人，却只占有 20—30% 的土地。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为谋生计，不得不向地主租地耕种。地主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地主不劳而获的地租，一般占农民辛勤耕作收获的 50%，甚至 70—80%。许多地区地主还强迫农民交纳附加租、预租和押租等^①。除此以外，农民还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和无休止的差役。

中国的地主往往是兼营商业和高利贷。他们操纵了农村市场，特别是粮食市场，通过控制价格，贱买贵卖，牟取暴利。同时他们还以苛刻的条件，向农民放债，进行盘剥。抗战前货币借贷月利率一般为 4% 左右，实物借贷则达 7—10%；抗战以后，由于货币不断贬值，利率之高，更骇人听闻。在封建剥削制度的压榨下，几亿农民始终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农村经济日趋萎缩，濒于破产。

3、腐朽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直接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

在帝国主义扶植下，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官僚，凭借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和武装力量，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搜刮了大量的资财，逐步形成庞大的官僚资本。在抗战胜利后，由于接收了日伪的企业和资财，加上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和兼并民族资本、搜刮人民财富，四大家族的经济势力更加急剧地膨胀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垄断集团。到全国解放前夕，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

^① 押租是地主出租土地时向农民勒索地租的一种保证金。预租是农民向地主租佃土地时预先交纳的地租。

达到 2,448 家，占全国 3,489 家银行总数的 2/3。官僚资本在全国的工业资本总额中占 2/3，在工业、交通的固定资产总额中则占 80%。它掌握了全国钢铁产量的 90%，煤的 33%，电力的 67%，水泥的 45%，全部的石油和有色金属，占有全国纱锭的 40%，布机的 60%。此外还垄断了全国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在轮船总吨位中独占 44%，并控制了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它们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是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

上面所说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三位一体，相互勾结，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反动的生产关系。他们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严重障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陷于贫困落后的主要根源。

4、民族资本在现代经济中力量软弱，不得不依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封建制度的衰朽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在清朝末年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自顾不暇，一度曾发展较快。1936 年民族资本在整个工业资本中曾占 37.8%。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资本所代表的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对于促进生产社会化、近代化和民族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垄断经济命脉和商品市场，封建势力又设置重重障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资本非常软弱，也十分落后。民族资本的工业投资，绝大多数

集中在轻纺工业上，基本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基础，同时资金少，一般都属小型企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不但无法在市场上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企业竞争，而且在资金、设备、原材料、技术甚至销售和运储上，都不同程度地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或官僚资本，有许多工厂还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需要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期间，这些本已十分虚弱的民族工业，或被战争破坏，或被日寇军管，只有极少数迁到内地，苟延残喘。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疯狂扩张，特别是通货恶性膨胀，正当的生产经营已不能维持，以至几乎所有的民族资本都卷入了投机买卖的风潮，因而民族工业日趋衰落，大多已濒临破产或半破产的窘迫境地。据统计，到解放前夕，全国尚有民族资本工业企业 12.3 万家，职工 164 万人，年产值 68 亿元（折新币，下同）；民族资本商业 13 万家，从业人员 99 万人，资本额 14 亿元左右。

帝国主义的入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和自给自足经济的破坏，对我国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一个巨大冲击，许多人被迫陷于破产。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束缚下，生产力发展极为迟缓，因而与落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细小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依然大量地、广泛地存在，仍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和部分生产工具的主要生产者。他们所处的条件更为艰难，不得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经济的三重压迫与剥削下挣扎。

5、经济十分落后，劳动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的生产关

系严重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加上连年战争，经济十分落后、混乱。抗日战争前的 1936 年，我国国民经济中，近代工业只有 10% 左右，产业工人约 300 万人，只是全国人口的 0.6%。主要工业产品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钢只有 92.3 万吨，原煤只有 6,188 万吨，电不到 60 亿度，而且大部分是由日本侵占下的东北所生产。当时比较发达的纺织业，产量也很低，棉布最高产量为 27.9 亿米，加上进口的棉布及农民自纺自织的土布，全国平均每人消费量才 5 米多一点。就是这样十分落后的工业，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人民发动的十多年战争中，又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使重工业生产大约下降 70%，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 30%。工业结构畸形发展，轻工业占全部工业的 70% 以上，重工业不到 30%。在重工业内部，也是门类残缺不全，互不协调，多数是采矿业，或生产初级原料的工厂；没有自己独立的机器制造业，仅有一些从事修理和装配的工厂。不论轻重工业企业，多数生产规模很小，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或多或少依赖于外国。工业布局极不合理，主要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几个大城市。例如电站，90% 以上的设备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少数大城市。纺织工业，仅上海、青岛、天津三大城市的棉纺锭和布机，大约要占全国的 70% 左右；上海一地的毛纺锭，约占全国的 75%。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旧中国落后的半殖民地工业的特点。

我国素称以农立国，但是由于长期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粮食只有 2,774 亿斤，棉花还不到 1,700 万担。经过连年战乱，又大幅度减产。在生产水平低、

交通运输困难的情况下，我国沿海城市每年进口大量小麦和大米。1946 至 1949 年，全国纱厂用棉有半数依靠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

对外贸易长期入超，据统计，1926 至 1936 年间，平均每年入超近 5 亿美元，占这期间平均进口总值的 $1/4$ 还多。抗战胜利后，入超更严重，1946 年入超额较战前增加了二倍。

国家财政连年入不敷出，通货急剧膨胀。从 1937 年 7 月到 1949 年 5 月的 12 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 1,400 多亿倍，物价上涨了 8.5 万多亿倍。

在上述落后、混乱的经济生活中，我国人民生活十分艰辛，广大劳动人民由于苛重的剥削与压迫，穷困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据调查，1935 年上海 4 至 5 口人的工人家庭，每月生活费最低需 38.85 元，而上海产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除造船业男工外，都达不到这一水平，而且经常面临失业的威胁。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和高利贷的压榨下，糠菜半年粮，生活挣扎在饥饿线上。至于医疗保健与文化教育根本谈不上。解放前我国人口死亡率很高，天花、鼠疫、霍乱、血吸虫等传染病广泛流行，不但医疗保健机构寥寥无几，每千人只有 0.14 张病床，而且费用昂贵，一般人都很难就医。全国每万人中只有大学生 2.2 人，中学生 23.8 人，90% 以上的中国人民，都是文盲。这就是解放前旧中国贫困落后的人民生活。

(二)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中国人民从近百年来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造成中国贫困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榨和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如何摆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剥削，如何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无数志士仁人在漫漫黑夜中曾苦苦摸索。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了，说明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的民主主义革命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在国际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根本走不通。中国共产党内一些教条主义领导者，机械地搬用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企图一举实现社会主义也碰了壁。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结合中国自己的特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中，逐步认识了中国的国情，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向胜利的科学道路。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它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在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是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

中国所不可避免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同时社会主义因素也会得到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再加上国际上的有利环境。中国完全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

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依靠广大农民同盟军，并且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揭开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在这革命转变的历史时期即将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着重研究了新政权面临的有关经济的方针和政策。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明确。后来，毛泽东指出：“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①根据这一纲领的要求，各解放区即已开始实施。到建国前夕已有1.2亿农业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随着城市的接管也没收了大批官僚资本企业。但在1949年初以前，我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解放区主要是偏僻的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十分突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253页。

当全国城镇即将全部解放，大规模的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时，如何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改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以及如何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使我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问题，就历史地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面研究了我国政治经济情况，认为夺取政权以后，首先必须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即：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立即由中央政府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七届二中全会着重分析了我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与主要途径。指出：旧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现代工业只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是中国革命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我国建国后应该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即：

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

对于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其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

的向前发展。但同时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其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使之在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存在和发展。

对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90%的分散、落后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可能马上改变。但是，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废除，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个体经济是有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必须组织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是个体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形式。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但这种经济制度的建立，还没有解决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在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后，在国内还必须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国外还存在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建国以后，决不能忽视对内节制资本、对外统制贸易，只有在经济斗争中坚持这两个基本政策，才能保证我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

七届二中全会还特别强调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指出：现在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

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而我们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就首先要重视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城市中其他工作，都应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七届二中全会为我国经济发展所规定的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从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出发，符合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的。它的基本方针政策，于1949年9月正式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采纳，成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准则和奋斗目标，有力地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